

蘇共眼中的毛匪

畢英賢

在共產世界中，毛匪澤東是蘇聯共黨極其痛恨的意識形態的敵人。當九月九日毛匪死訊傳到莫斯科時，蘇共報紙僅作寥寥數語的報導，對其生平未作評述。事實上，自從六〇年代初期匪蘇公開爭執時起，雙方相互攻擊的文件甚多。因此，蘇共對毛匪本人及其思想與政策早已作過有系統的批評。

一國對他國政策的理解是其決定對該國政策的基本變數之一。本文根據蘇共文件，扼要綜述蘇共如何理解毛匪及其思想與政策，俾有助於探測蘇共對中共的態度與匪蘇關係轉變的可能。

對毛匪的評析

在匪蘇關係惡化之前，蘇共文獻對毛匪澤東極盡頌揚；而匪蘇公開決裂後，則把毛匪攻擊得體無完膚。茲以「大蘇維埃百科全書」一九五四年版與一九七四年版所載毛匪生平為例，比較蘇共對毛匪前後不同的描寫與評價①。

在形式上，舊版百科全書中「毛澤東」佔五頁之多的篇幅（或八直欄），並附有毛匪整頁照片。新百科全書上，毛匪所佔不足兩直欄（即不滿三分之二頁），所附照片僅一吋而已。單從這種差異看，可知事隔二十年，毛匪在蘇共眼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

就文字內容看，在舊版百科全書中，看不出貶損或批評毛匪的詞句。相反的，把毛匪捧為「傑出的中國政治及政府活動家，卓越的理論家、馬克斯主義者，富有經驗的中國共產黨領袖……」。在新版百科全書中，則僅稱他為「中國政治與政府活動家」，不直接介紹他在匪黨中的地位。此外，這一條又幾乎用了一半的文字批評一九五八年以後的毛匪政策。

一九五九年，蘇共出了一本書——「我們的朋友：中國」。有趣的是，在這本書內，對毛匪既不捧也不貶②。一九六〇年四月十六日中共發表「列寧主義萬歲」一文，於是在匪蘇意識形態方面發生了公開爭執。起初，中共僅泛泛的指責「修正主義」，且以南斯拉夫為主要對象。蘇共則泛泛的攻擊「教條主義」，而以阿爾巴尼亞為主要對象。經過十數年的論戰，蘇共把批評或攻擊中共的一切內容歸納成一個名詞，那就是，「毛主義」（或毛思想）。按照蘇共的說法，「毛主義」乃是「現代世界革命運動中的特殊

註① 「大蘇維埃百科全書」(Bolshaya Sovetskaya Entsiklopediya)，第一版(1954)，見「毛澤東」條；第三版(1974)，見「毛澤東」條。

② 「我們的朋友：中國」(Nash Drug Kriai)(莫斯科：國家政治文獻出版社，一九五九)，第一九八——二〇〇頁。

意識形態和政治潮流」。它的出現並非偶然，有其客觀的背景^③。根據蘇共的說法，毛匪很早就加入叛亂，當初他的社會觀點與馬克斯主義相距甚遠。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間，無政府主義^④思想在中國流行頗廣。一九一八年末，毛匪至北平，結識了一些積極的無政府主義分子。他甚至曾號召組織湖南無政府主義會社。這一點毛匪本人曾數次在西方學者面前承認過^⑤。

毛匪於一九二〇年加入共產組織，第一次讀到「共產黨宣言」。蘇共說，按照毛匪的行為來看，這個轉變並沒有稍減毛匪意識中的無政府主義觀念。在中共所謂的「文化革命」期間，紅衛兵的橫行就是無政府主義觀點的表現。

毛匪對馬克斯主義其實是一知半解^⑥。毛匪不懂任何外國語，因此他的著述或講詞所引錄的馬克斯主義經典著作中的文或句，都不是第一手貨色，而是經過曲解的或斷章取義的第二手材料。另外，毛匪也極端「自由」地闡述馬克斯、恩格斯及列寧等的思想，以致於他所引用的每一句或每一段話皆屬進了毛匪自己的意思。

毛匪不重視書本知識^⑦。他認為讀書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比煮飯切肉容易得多。書本知識是半知識，不能與個人從經驗中學來的知識相比^⑧。

蘇共分析道，在毛匪的行為中，表現出個人崇拜傾向，對羣衆的輕視態度，以及喜歡把個人的意志強加於羣衆的作風。蘇共認為，毛匪的個人崇拜乃是毛匪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及心理的產物和表現。「毛主義」則是小資產階級中各階層內部矛盾衝突的反映；他們從無政府主義的「超級革命性」驚退到對「領袖」的唯唯聽命與像神一樣的崇拜^⑨。

所謂毛主義

按照蘇共所下的定義，「毛主義意識形態」是「科學的無產階級理論」的一種小資產階級宗派主義的修正形式，它藉着建立毛匪澤東的個人崇拜與把他說成是無所不知、完美無缺的「偉大舵手」等等手法，把「無產階級理論」降為神祕的宗教性意識^⑩。

③ 魯芒柴夫(A.M. Rumyantsev)，「『毛澤東思想』之根源與演變」(Stoiki i Evolutsiya "Idei Mao Tse-duna") (莫斯科·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二) 第五頁。
④ 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在任何歷史條件下都應廢除社會中的一切國家政權。共產黨認為，這種思想不懂得「階級鬥爭」是實行社會主義的創造力。

⑤ 例如，見斯諾(SNOW)之「中國上空的紅星」(倫敦，一九三七年出版)第一四九頁；及倍恩(R. Payne)之「一個革命者的畫像·毛澤東」(倫敦，一九六二年出版)第五八——五九頁。

⑥ 魯芒柴夫，「毛澤東思想」，第十四——十六頁。

⑦ 同前，第十九——二〇頁。

⑧ 毛匪在延安之講詞，原載「改造學習」(一九四二年)第一期。

⑨ 魯芒柴夫，「毛澤東思想」，第二十五頁。

⑩ 魯芒柴夫(主編)，「科學的共產主義」(Nauchni Kommunizm) (莫斯科·政治文獻出版社，一九六九)，第八一——八三頁。

毛派匪幫一向吹噓「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斯主義的「中國化」，但是在蘇共理論家的分析下，毛主義僅是以荒謬絕倫的「暴力論」來代替唯物史觀。

依照蘇共的說法，在中國社會思想史上，「暴力論」起源於一些舊的哲學派別，例如中國古代法家認為，在政治上極端的和冷酷的措施是必需的，政權祇有靠力量與強制來維持。在歷史上，「暴力論」與黷武思想相交織，在現代，「暴力論」同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不可分割。誰染上了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誰就會傾向「暴力論」，誰就會寄望於戰爭手段，誰就會低估或忽視經濟發展與經濟問題¹¹。

從「暴力論」中很自然地衍生出毛匪的戰爭史觀。毛派份子宣傳，戰爭是解決社會矛盾的主要手段。毛匪說過：「戰爭——從私有財產和階級以來就開始了，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鬥爭形式」¹²。

蘇共理論家認為，毛匪以戰爭史觀代替了馬克斯的階級鬥爭史觀。按照毛匪的意見，不用階級鬥爭規律而要用戰爭規律來指導政策；階級鬥爭本身應在戰爭規律中來理解；階級鬥爭要服從戰爭規律¹³。這與馬列主義格格不入。

毛匪的「槍桿子出政權」其實是從中國軍閥的「有軍隊就有政權」演繹而來的。按照毛主義的邏輯，最後決定一國政權的問題，不是複雜的經濟關係，而是槍桿子和軍隊。準此，改造世界祇能靠槍桿子了。因此，毛匪要別人相信，要達到全世界持久和平與社會主義勝利，唯有經過世界大戰這一途徑。即使在未來世界大戰中人類被消滅一半，剩下的一半就可生活在「社會主義」之中。

蘇共以為，毛匪幫一心想由蘇聯掀起這個戰爭；由於蘇聯沒有如此做，中共就宣稱美蘇勾結，蘇共墮落為「修正主義」等等。事實上，毛匪乃是使用「坐山觀虎鬥」的策略¹⁴。

蘇共指責毛匪所提出的「矛盾論」乃是把辯證唯物論庸俗化，排斥了「否定的否定」和「量變轉化為質變」的定律。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毛匪在「關於哲學問題講話」中說：「恩格斯講了三個範疇，我就不相信那兩個」，而「最根本的是一個對立統一」。結果，毛匪利用「對立統一」推演出「一分為二」的理論，為其分裂運動作理論基礎¹⁵。

依照毛匪澤東的意見，「發展」就是一種矛盾在運動過程中移轉到與過去相反的方面。蘇共理論家批評說，在這種觀點之下，把矛盾當作固定的，永久不變的；這就忽略了辯證法最重要的原理。「發展」，在本質上，是由一種質到另一種質的過渡，在這個

¹¹ 費多賽耶夫 (P. Fedoseev)，「馬克斯主義與毛澤東主義」，「共產黨人」(Kommunist)，第五期(一九六七)，第一一頁。

¹² 毛選(北京，一九六九)第一卷第一五五頁。

¹³ 費多賽耶夫，「馬克斯主義……」，第一一一——一二頁。

¹⁴ 同前，第一一二頁。

¹⁵ 阿爾泰斯基，伊里昂科夫 (M. Alatsky; E. Il'enkov)，「馬克斯主義辯證法的曲解」，「共產黨人」第十八期(一九七三年)第一〇〇、一〇二頁。

過程中，舊的一些矛盾逐漸被克服。如此看來，毛匪的「矛盾論」乃是一種「平衡論」。根據這種理論，平衡時時刻刻遭到破壞，然後恢復平衡，周而復始繼續推延下去。蘇共批評說，如此理解辯證法就破壞了它的基礎；在本質上，否定了發展的意義。如果一切現象僅是破壞平衡與恢復平衡相互交替，那麼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就不會有質變或新的現象出現^⑭。這是馬克斯辯證法與毛匪矛盾論之間根本的差異。

首先，毛幫把現時代的世界劃分為四個矛盾，即：「帝國主義國家人民羣衆和壟斷資產階級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國主義侵略者的矛盾」，「社會主義制度和帝國主義制度的矛盾」，「愛好和平的世界人民和帝國主義好戰集團的矛盾」^⑮。一九七三年元旦，中共在其兩報一刊的社論以及當年八月「十大」的政治報告中，祇提到兩個矛盾，那就是：兩個超級大國和其餘國家的矛盾，以及兩個超級大國間的相互矛盾。對這個分類法，蘇共指責說，這些全不是對現時代的科學的、階級的分析^⑯。

毛主義的對外政策

著名的蘇聯中國問題專家卡必查(M. S. Kapisa)於一九六九年出版一本分析中共政策的書，書名是：「中共：兩個十年兩種政策」。書中說，在中國的「共產運動」史中，可以追溯到兩個主要派別的不斷鬥爭，這兩個派別是：馬列主義國際派和「民族主義」小資產階級派。第二個派別長期以馬克斯主義作偽裝，後來則帶有「中國化之馬克斯主義」色彩，現在則成爲毫無顧忌的、好戰的大國民族主義，小資產階級冒險主義。這個與毛匪澤東名字相聯的派別，目前正藉着暴力和肆無忌憚的煽惑伎倆，橫行於中國大陸^⑰。蘇共認爲，在一九五八年以前，中共的政策尙符合「現代革命」和「中國」的利益。對毛匪澤東而言，「社會主義思想」本身沒有多大用處，祇是達到他的目的的一種手段。毛式「社會主義」，更確切地說，毛主義乃是大國沙文主義意識形態，這與蘇共所奉行的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格格不入^⑱。

蘇共認爲，任何國家的對外政策都含有階級性質，受一國統治階級的經濟利益與經濟情況所限定；對外政策與內政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它也是對內政策的延續^⑲。從這個角度看，中共在國內，繼續採用蘇共的發展道路和經驗或是予以排斥這一問題反映在對外關係上，就是匪蘇關係的友好和不好。

最近，蘇聯學者把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中共對外關係分爲五個時期。第一時期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七年，第二時期從一九五八到

^⑭ 費多賽耶夫，「馬克斯主義……」，第一二二、一二三頁。

^⑮ 「列寧主義萬義」，「紅旗」，第八期（一九六〇），第七頁。按四大矛盾之說，源於列寧與史達林，共匪僅在用詞上有所改變，主將蘇俄列爲「社會」帝國主義。

^⑯ 阿爾泰斯基，伊里昂科夫，「馬克斯主義……」，第一〇三、一〇四頁。

^⑰ 卡必查，「中共：兩個十年兩種政策」(K.N.R. Dya Desyatitva Dve Politiki) (莫斯科：政治文獻出版社，一九六九)，第三——四頁。

^⑱ 科羅斯考夫(B. Koleskov)，「毛主義的對內與對外政策：直接與相對關係」(Vnutrennaya i vreshnaya Politika Maoizma: Pryamye i obratnye svyazi

^⑲ 阿斯菲耶夫，杜邊斯基(G. V. Astafiev, A. m. Dubinski)等，「中共對外政策與國際關係」(莫斯科：思想出版社，一九七四年)，第一卷第五頁。

一九六三年，第三時期從一九六三到一九六六年，第四時期從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九年，第五時期從一九六九年迄今^②。

蘇共認為，在第一個時期中，國際派佔優勢。事實上，毛匪澤東不能不考慮到中共當時微弱的經濟與軍事力量，故不得不同蘇聯及其他共產國家加強關係。在對外政策上，一般說來，中共領導尚能遵行「社會主義原則」。從一九五四年起，中共還喊叫「和平共存五原則」，很能得到一些鄰國的歡心。所以蘇聯稱這個時期為「參與社會主義統一戰線時期」。

蘇共認為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三年這一時期中，中共在對外活動上開始出現反「和平共存原則」的現象，且其「特殊方針」已開始形成。匪蘇關係在這個時期內開始轉壞，逐漸惡化。蘇共分析道，在蘇聯的援助下，中共第一個五年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有了一些成就；這就沖昏了毛共分子的頭腦，強化了他們的民族主義的大國沙文主義野心。毛匪想利用「大躍進」一舉來解決一切經濟問題，加速經濟發展。結果，「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及人民公社）使中共經濟遭受極大破壞。蘇共下結論說，這種政策的目的是強迫經濟發展，妄圖趕上並超過已開發國家；而忽視了科學的規律、準則和計算^③。在這時期中，中共會發動台海戰爭；蘇共認為，中共的目的之一在轉移國內人民視線，減輕人民對「三面紅旗」所造成的惡果的注意力。在這個「積極爭奪社會主義體系霸權」的時期中，毛派分子依然明白，他們還不能同蘇聯及其他共產國家公開決裂^④。

從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蘇共稱之為毛共「從自我孤立於社會主義大家庭之外過渡到與他們公開對抗」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其對外路線已完全脫離「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墮落為沙文主義與顯而易見的「種族主義」。毛共分子宣稱，當今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民族解放運動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蘇共則堅執，主要矛盾仍舊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因此，毛派認定第三世界是世界一切矛盾的焦點。同時，毛派暴露了在第三世界爭取霸權的野心。在這個時期中，毛派猛力攻擊蘇聯的政策，並歸納為「和平共存」、「和平競賽」與「和平過渡」；似乎蘇聯已放棄階級鬥爭。蘇共堅決否認此點，並宣稱：「工人階級和被壓迫人民，為了解放，可以根據具體條件……選擇任何鬥爭道路，武裝的或非武裝的^⑤。」

中共對外關係的第四個時期就是「文化革命時期」（一九六六——六九）。在一九六六以前，毛匪澤東對外關係的「特殊方針」業已形成。蘇共指出，此時中共上層在內政問題上相互鬥爭；在國際上由於印尼共黨（一九六五年）政變慘敗與第二屆亞非會議的流產，毛政權陷於國內與國際的窘境之中，而毛匪不知更正錯誤，反而組織造反——「文化革命」——以消除反對派並實行軍事實僚專政。在「文化革命」期間，「紅衛兵外交」變成中共國際關係的準則；同時中共號召以「人民戰爭」反對「帝國主義」。蘇共認為，在這個策略中含有以中共為中心的對外政策綱領。中共一方面設法不同美國發生軍事衝突；一方面企圖擡起美蘇之間的

② 同前，第十三頁。

③ 斯拉科夫斯基，蘇哈楚克（M. Slavovskii, G. Sukhachuk），「中共：經濟、政法、文化」（莫斯科：科學出版社，一九七〇），第八五——九五頁。

④ 同註②，第十六——十九頁。

⑤ 同前，第十九——二十一頁。

核子戰爭以便坐收漁利，表面上則叫囂「美蘇勾結」。蘇共認為，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六九年）是中共對外政策執行「反社會主義、反蘇聯方針」新階段的開始^{②⑥}。

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之後，在對外關係上已放棄使用毛派份子的極端方法，恢復了正常外交。但是，蘇共認為，在現階段和以前幾個時期之間仍存在着一個邏輯上的連繫和中共政策的基礎。那就是「反蘇主義」。一九七三年中共召開十大，但並沒有改變毛派分子的反蘇方針^{②⑦}。

今年初，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批評中共對外政策時說，這個政策不僅與「社會主義原則和理想」不相關，而且成爲「帝國主義進行反社會主義鬥爭的重要預備隊」。基於這個原因，中共試圖破壞和解、阻撓裁軍、在國家與國家間散佈不信任和敵意，並竭力挑撥世界大戰以便乘機取利^{②⑧}。

結論

基於以上的敘述，至少可歸納出下列三點結論：

第一，在蘇共看來，一九五八年是匪蘇關係的轉捩點。匪蘇關係逆轉的基本原因，表面上看，是中共揚棄了蘇聯的發展模式，改用毛主義模式；實質上，就是兩個模式的鬥爭、兩個共黨政權爭奪社會主義體系霸權的鬥爭，後來發展爲共產運動領導權的鬥爭。質言之，匪蘇爭執的基本問題是：「誰領導誰？」

第二，蘇共竭力把毛共描寫成非共產主義者，並設法把它逐出共黨集團，這是徒勞無益的。正如，毛共把蘇共描寫成「修正主義」、「復辟主義」一樣。在本質上，匪蘇共黨大同小異，都是馬克斯主義的變形體，且保留有絕大部分馬克斯主義的特色。雙方不僅堅持此點，而且都以正統自居。

第三，蘇共在宣傳上把中共一分爲二——國際派與毛派。蘇共同情和讚揚國際派，攻擊批評毛派。可以想像，在實際上蘇共很可能暗中助長國際派，使中國大陸再度出現一個親蘇，或者至少不反蘇的共黨政權。

如今，與蘇共爭奪共產運動領導權的人已入黃泉，匪蘇關係的演變已成爲國際人士注視的中心點。不過，毛匪雖斃，毛派不一定立即解體。毛派縱然在派系鬥爭中失敗，匪蘇關係上也不會有戲劇性的轉變，因爲匪蘇間之基本衝突的因素，仍然存在，并未因毛匪之死亡消逝。

②⑥ 同前第二十一——二十五頁。

②⑦ 同前第二十五——三十頁。

②⑧ 布里茲涅夫，「蘇共中央委員會總結報告」，共產黨人，第四期（一九七六），第九頁。